雷达文学批评访谈与研究



张继红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继红（1978-　　）

男，甘肃甘谷人，文学博士，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现任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达文学馆”馆长，兼任天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化进城中的‘城—乡’关系与社会文明价值建构——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书写研究”1 项，主持完成甘肃省教育厅项目、中央高校科研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等 4 项；出版著作 2 部；科研成果获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甘肃省文艺评论奖、麦积山文艺奖等；获“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甘肃省技术标兵”“天水师范学院教学优秀奖”等荣誉称号，入选天水师范学院“青蓝”人才工程。



雷达文学批评访谈与研究

张继红 ◎编著

学术顾问
白 烨 程金城
张清华 李晓东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编选前言

一

雷达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散文作家，历任《文艺报》编辑、评论组副组长、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中国作家》副主编，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期刊、报纸发表文艺评论10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计500余万字，其中《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人文精神”质疑》《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等40余篇文艺评论和散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雷达立足当代中国文学全局发展的眼光，提出并论证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亚乡土叙事”等文学观念，深度介入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写实主义”“新世纪文学的内涵”等重要文学思潮的概括和阐释，被称为“旋转于当代文学上空的‘雷达’”。同时，雷达对新时期以来40年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均作了及时而充满生命激情和思辨力量的回应，特别是对“陕西三大家”对比、“甘肃小说八骏”推介、“西部乡土小说”评论等方面用功甚深。在40年的批评历程中，他在推介新秀、概览思潮、重塑经典、重估价值等方面成绩卓著，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独具风格的“雷达现象”。

二

2018年3月31日，雷达先生病逝于北京，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重大损失。雷达一生坚守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方法，

以执着而雄辩的论证、广博而开阔的视野致力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开拓了现实主义美学版图，被刘再复称为“共和国第三代文学评论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雷达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在场批评家。雷达个人的文学批评史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见证史，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以及“中国化批评诗学的建构”产生了广远的影响。但是，作为批评家和研究者的雷达，其意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发掘出来。《雷达文学批评访谈与研究》是雷达先生逝世后第一部系统梳理、整体研究、全方位概括雷达一生的文学批评历程、文学观念的产生、文学风格的形成的编著。该著主要分为雷达文学批评历程对话、批评美学风格概括、“中国化批评方法”阐释、多元话语与意义建构等六大特色内容。

第一部分：批评历程与学术对话。雷达在谈及自己的批评理想时曾多次表达，自己作为批评者，向来追求赤诚和热情，追求犀利和明快，追求“修辞立其诚”，那么这种立意和批评理想源自先天质素还是后天努力？本著“批评历程与学术对话”部分，主要由雷达的博士生刘青汉、张继红，以及《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小说界》的舒晋瑜、刘颋、王童等专业编辑对雷达先生生前几次近距离深度访谈组成，且访谈的内容贯串了该著的每一个版块，较为全面、直观地再现了雷达先生的家庭背景、求学历程、批评追求、自我定位、价值期待等信息，勾勒了雷达文学批评主体性生成的复合语境，为雷达文学批评和散文创作研究呈现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第二部分：批评美学与语体风格。该部分主要收录了罗荪（孔罗荪）、朱向前、李敬泽、李清霞、张晓琴、韩伟等前辈、后学对雷达批评美学风格的宏观研究论文，较为系统地确立了雷达现实主义批评美学中的“理性的激情”“历史的、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政治话语与美学话语的整合平衡的思想结构；同时，也编选了涉及雷达美学批评的整体观、本土性的美学建构的论文。这是雷达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建构关系当中亟须整合的资料，应当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其产生的成果将不断丰富和建构雷达文学批评的美学风格及其审美精神。

第三部分：本土化批评及其价值阐释。雷达之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武器的获得，既有“义理、考据、辞章”的训练，也有一种能够随时展开印象式主观批评的禀赋，既有深厚的历史感的逐渐自觉，也有真切的哲思和启示性追求。该部分主要收入刘再复、程金城、赵学勇、任美衡、晏杰雄等新时期以来对雷达批评方法作系统阐释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雷达的文学批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方法和思想资源与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本土性等问题。论者认为雷达文学批评方法成就的获得，与雷达始终站在新时期文学前沿，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以及真切感知“中国经验”的个人阐释密切相关，从而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序列中独特的“这一个”。所以，“雷达先生不断地为建构中国化批评诗学的理论体系而努力，而且其批评文字紧紧地和中国大地、中国社会，并将中国现实与中国语境融为一体，表达了批评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深切的关怀和忧患，这样的批评文字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

第四部分：多元话语与意义建构。自雷达的批评风格被赋予“理性的激情”“历史的、美学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表征，以及雷达对当前文学症候作出评判之后，既有理论家、批评家发文与之商榷，甚至不乏“个人化色彩”浓烈、独辟对话视角的精短之作，也有以深厚的学理进行学术建构的理论长文。若能相互参看、比照其生动活泼的批评争鸣和话语交锋，定能在见仁见智中发现批评新视点。本部分主要编入李伯勇、张志忠、牛学智、李清霞等学者的论文，将雷达文学批评的中国化美学特征与西方文化研究、“新批评”等批评路径相结合，一方面指出了雷达文学批评话语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中国化批评风格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结合的可能性。

第五部分：文学批评与散文创作。雷达以宏阔的全局眼光、惊人的阅读数量、炽热的批评激情、真诚的建构意识参与了近40年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小说批评，是一位始终“在场”的批评家；同时，他以“小说笔法”创作了大量以西部、故乡为题材的散文作品，“让真正的历史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中”，充分彰显了其散文写作中的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从而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其散文创作主体的知性与灵性。那么，他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和散文史坐标中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古耜、贾平凹、阎晶明、李兴阳、薛世昌等作家、学人的论述，以及舒晋瑜的访谈，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阐释。

第六部分：批评职业与批评家的宿命。郭沫若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这一部分编选了白烨、李国平、梁鸿鹰、徐兆寿、杨光祖、宋俊宏等学者的论文，以及刘颋的雷达访谈录。论文和访谈主要从职业批评家的个人修养、思想承传、职业习惯以及他者评价等角度对雷达先生作了点线勾勒，既有感性把握，也有学理的论述。该辑编选的目的在于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文学角度，在研究视野方面拓展雷达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意义。该部分虽有回顾与总结的意味，但最终目的是以此引发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学术对话，以助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良性发展，这也是雷达一

以贯之的“以作品为先”“以发现意义为目的”“要着眼于发展”的批评精神所在。

三

2018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文学界深情缅怀雷达先生的《挥别大师——当代中国文学视野中的雷达》（靳莉、高凯主编）；2019年4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山高水长　风行草偃：雷达先生纪念文集》（李敬泽、徐兆寿主编），作为纪念、缅怀故人的即时性怀人散文，其言由心生的真挚、自然，令人感慨。倘若要在文学研究的时间长度中，客观、理性地评价雷达文学批评的意义，尚需要宏观、理性的议论和深度分析。《雷达文学批评访谈与研究》的出版，将与《挥别大师——当代中国文学视野中的雷达》《山高水长　风行草偃：雷达先生纪念文集》等编著相呼应，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以及“中国化批评诗学的建构”，当是一种增益。

需要提及的是，雷达先生去世前，欣然将3000余册书籍、400余份书信题签、300余张照片、5本手札等珍贵资料赠予天水师范学院，表示愿为家乡的高校以及甘肃文学研究“做点贡献”。雷达先生去世后，其家属又将1000余册书籍、20余幅书画等二次捐赠给天水师范学院。经过3年多的筹建，天水师范学院已完成“雷达文学馆”的建设，并于2019年9月28日召开了“雷达文学馆开馆仪式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前沿问题研讨会”，国内40余名学者和批评家对雷达先生的文学批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这对全面评估雷达文学批评有重要意义。

该编著从批评历程、批评美学风格、“中国化批评方法”等六个角度整合雷达文学批评的批评史和文学史价值，对比分析中国化批评诗学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策略和价值选择，以期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性建构”。需要说明的是，在编选过程中，有关雷达先生生平经历、重要观点引述，在不同的论文中若有重复，编者将根据前后文的信息关系，在保持原文风格、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删减部分明显的重复信息，做部分格式调整，在此谨向原作者说明，并对同意将自己的学术成果编入此著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19年8月

目

录

第一编　批评历程与学术对话

001 | 中国当代文学呼唤人道的精神资源

——雷达先生学术访谈录/刘青汉

009 | 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

——访文学评论家雷达/舒晋瑜

014 | 世纪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雷达访谈录/张继红　雷　达

022 | 与评论家雷达对话/王　童

第二编　批评美学与语体风格

039 | 评论在发展

——《小说艺术探胜·序》/罗　荪

042 | 立高岗之上，尽览风行草偃/李敬泽

044 | 旋转在当代文学天空中的“雷达”

——关于文学评论的提纲/朱向前

059 | 政治话语与美学话语的整合与平衡
——评雷达的文学批评/李清霞
068 | 雷达批评的精神风骨/韩　伟
070 |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论雷达批评的当代意义/张晓琴
077 | 文体、传统与当下缺失
——当代长篇小说求问录/雷　达　张继红

第三编　本土化批评及其价值阐释

087 | 雷达是中国第三代文学评论家的代表人物/刘再复
088 | 雷达文学批评的历史感与启示性
——读《雷达自选集·评论卷》/程金城
094 | 一个有温度的批评家/赵学勇
099 | 论雷达的中国化批评诗学/任美衡
107 | 文学史视野中的本土批评和主体批评
——“雷达的文学评论”/晏杰雄
113 | 新时期文学现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
——雷达访谈录/张继红　雷　达

第四编　多元话语与意义建构

125 | 也谈“当前文学创作症候”之根源/张志忠
130 | 雷达与当前“宏观批评”问题/牛学智
141 | 论雷达的文学编辑思想/李清霞
149 | 文学评论注意力的转移
——评雷达《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李伯勇

第五编　文学批评与散文创作

159 | 浸入生命的忧思与美感
——读雷达散文/古　耜

163 | 读雷达的抒情散文/贾平凹

166 | 飞翔的“思想”
——从《雷达散文》感知灵性/阎晶明

170 | 缩略时代的精神还乡
——雷达西部散文艺术谈片/李兴阳

174 | 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薛世昌

183 | 心灵自传与散文艺术
——访评论家、散文家雷达/舒晋瑜

190 | 我心目中的好散文/雷　达

第六编　批评职业与批评家的宿命

195 | 评坛“这一个”
——雷达其人其文漫说/白　烨

199 | 雷达论/杨光祖

210 | 雷达是一个什么人/李国平

212 | 雷达作为评论家的意义及其他/梁鸿鹰

215 | 雷达的评论世界及其意义/徐兆寿

228 | 文学信仰与批评家的宿命/宋俊宏

239 | 天真又较真的批评家雷达/刘　颋

附　录

249 | 雷达文学馆解说词/张继红　李清霞　等

编后记　258

第一编 | 批评历程与学术对话

中国当代文学呼唤人道的精神资源
——雷达先生学术访谈录

刘青汉

刘青汉（以下简称刘）：雷先生，您好，承蒙《甘肃社会科学》董汉河先生盛意，作为您的学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请教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恳请您赐教。2006年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您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引起学界巨大反响与热烈回应。很多学者认为，您准确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状况的真实感受，认为您揭示的问题是客观的、严肃的和深刻的，您呼唤的精神内涵是有价值的；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时过三年，请您在文学的立场，在人生的层面，精确表达一下，您所呼唤的，究竟是什么精神？

雷达（以下简称雷）：我想主要还是人道的、爱的、宽容的，以人为本的，有利于人的健全发展的精神，希望当代文学表达更多的天理和人道的内涵，希望当代文学的批评者拥有天理人道的心肠肺腑。纵观中国当代文学，需要仔细看一看，其主要精神，究竟是正面价值的还是负面价值的，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拥有、捍卫真理的还是背离、毁损真理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是爱的还是恨的，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是公义的还是褊狭的，是讲天理讲普世道理的还是讲私理讲狭隘道理的，是人道的还是非人道的，是滋养人的还是损伤人的？我这样不无尖锐地提问题，是想转换一下视角，想从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种更侧重人类性的、现代性的，以往较少使用的视角看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今天非常重要。这些问题无法回避，否则我们的文学会走向空洞化、戏谑化、调笑化的浅薄，遭到消解或成为某种附庸物，失去存在的充足理由。对这个复杂问题当然不能作简单化的结论。我们有必要冷静下来全面地看一看，在很多时段，在很多思潮流派中，我们的文学究竟偏重于哪些方面，忽略了哪些方面，我们现实人生中最宝贵的究竟是什么，最应该防止和警觉的是什么，哪些宝贵的因素应该倍加珍惜，哪些不良的因素应该时刻预防？我发现，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一些非常重要的要素，该谨慎的却被恣狂了，该珍惜的却遭到漠视，该呼唤的没敢直面。我希望中国当代文学汲取健康的精神资源，希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更加积极地介入真理的探究和人生幸福的引领、哺育和造就。这也就是我一直强调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意思。

刘：这实际上牵涉到另一些重要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精神的内在本质究竟如何，以及什么是人类恒久有益的精神品质等问题。如果先读《甘地传》（印度）、《小妇人》（美）、《悲惨世界》（法）、《敬畏生命》（法）、《寂静的春天》（美）、《卡拉马佐夫兄弟》（俄）、《冷暖人间》（日）、《纳尼亚传奇》（美）、《墨索里尼的女儿》（意大利）等文本，充满着内在的温馨、安静、怜悯、体恤、善良、宽容、人道及永恒的盼望，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爱与体恤的良性循环，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五四”以来的主流思想资源？

雷：上面你提到的国外文本我只读过一部分，我想不可一概而论地谈国内的、国外的，也不宜认为国外的皆好、国内的皆糟，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但你所举作品，确实充满了人道精神。在我国，“五四”的声音是较为多样的，资源是较为丰富的；当然，“五四”时期毕竟关注“破”的一面多，关注“立”的一面少。进入当代文学时段，特别是“十七年”到“文革”，思潮的主流日趋狭隘，众多文本首先设置一些对立的东西在里边，有形或无形，潜在或显现，抽象或具体。那个时期（的）作品，普遍传达着敌对的和争斗的信息，那时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基本上是憋足了劲向敌对的东西宣战，理论思潮和流派多是斗争和仇恨的激昂慷慨。这种只要斗争不要和谐的思想其来有自，与“文革”的荒谬很容易一拍即合，“文革”时代是一个只要恨不要爱的时代。从长远眼光看，正如鲁迅所说，文学是要人生，不是要人死。我们知道，一百年来的中国，通常被认为经历了三个大的意识的觉醒，在清末民初是“国家—民族”意识，在“五四”是“个体—个性”意识，在二三十年代以来则是阶级斗争意识的觉醒。这三大意识几乎覆盖了整个百年中国思

想史，而阶级斗争意识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主宰权，它的兴盛也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理由，后来走向极端，最终成为一种大灾难。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的现代化意识再次大觉醒并得到了肯定，于是，和平、发展与建设成为时代的主调，中国社会出现了勃勃生机，我们也才有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然而在精神领域，旧的后遗症和新的溃败症甚至诚信系统的被摧毁是作为一种沉重代价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的文学当然需要正视丑恶和揭露黑暗面的勇气，需要大胆地看取真实的生活矛盾和精神性课题，这一点永远不能动摇，但不能把批判与建构、发现与重铸二者对立起来，那种仇恨的斗争的、二元对立的思潮并未完全绝迹。在新的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培养出了好几代新人，新人们大都有全新理念和不同的精神风貌，但有时在骨子里，也许仇恨和斗争的童年记忆在不知不觉中转换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的能量。当人们把注意力较多投射到都市、欲望、物质、权力、资本时，也就是如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有人所说的，时代风尚趋向媚俗或低俗时，最普遍和最深广的元素依然是与拐骗、打杀、冷血、暴力相关的东西。《疯狂的石头》《功夫》《满城尽带黄金甲》《卖拐》之类，或者比它们更差的东西充斥在新世纪前后的舞台和屏幕里，渗透在游戏、电视、电影、小说和日常闲谈里。这种状况令人担忧，这种把刚性的斗争转化为软性的仇恨和拐骗，无边的纵欲和犬儒化的虚无的文学颇有市场。我希望的文学要高于现实，提升灵魂，能坚守人类的正面价值。

刘：纵观您的当代文学评论轨迹，在最严酷的“文革”时期和多次反复中，值得庆幸的是，您不是一个斗争工具式的评论家，而是一个坚守文学本位和坚守人文底线的评论家。您对此如何看？

雷：走过来都不容易，但能否守住某些最根本的东西是重要的。在不端正的社会潮流中个人的能量会被淹没，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时空中，个人不参与做坏事，或努力做一点好事，正面的努力都会对社会人生有良性意义，至少可以不增加伤害。所以人生多艰，人生要避免过于强势的袭击性行为，能守住多少就守住多少吧。

刘：有一个在我心里蕴藏很长时间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人道是人间所有人应该追求、应该捍卫、应该坚守、应该颂扬、应该珍惜、应该依靠的大道，为什么在我们的当代文艺思潮的一些阶段，有人却回避，甚至公然反对人道、批判人道？比如批评人道主义，我不太理解。如果把我们的国民，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亦即把我们的人生比作地上的花草树

木等有生命的存在，把人道比作雨水和太阳，那么，大地之上的花草树木应该是渴望阳光雨露、欢迎阳光雨露、珍惜阳光雨露、感谢阳光雨露的，我不理解的是，花草树木为什么要批判阳光雨露？

雷：这里有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但从整体上说，当代文艺思潮中强调“硬”的一套是多了，强硬延续的时间显然是太长了，那就是斗争哲学和二元对立。这其实并不是个文学问题，而是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哲学基础问题。若用当时强硬的眼光看，爱的、温情的、人道的思想与斗争和造反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是会软化人的斗志的，当然在批判之列。把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关乎所有人的健全发展的问题简单地归因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简单地用一句话绕过去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反人道的东西仍然需要好好反思。

刘：从一个角度看，当代文学的方法、技巧、术语热都是作家、批评家没有思想和不敢思想的逃避现实，对一些作家而言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消极表达，对一些作家而言是平庸的横空出世，因为像鲁迅那样真正杰出的作家虽然拥有和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但真正杰出的作家从来都是以关注人生为重的，关注人生以至于对纯粹为艺术而艺术嗤之以鼻。您对此如何看？

雷：是你说的这样吗？我没深想过。客观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方法有时候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方法，方法的解放和方法的出新有时候往往蕴含着精神本身内在的革新，蕴含着人生自由的内在渴望，蕴含着关乎自由的丰富的内在思想。比如80年代中期方法热潮中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新的《无主题变奏》等，肯定有方法和技巧之外的具有冲击力的人文诉求，再比如“文革”之后朦胧诗的出现，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等人言说的激情与开拓性的人生姿态，同样肯定有技巧之外的重要内涵。术语的涌现往往也有时代意义表达的必要性，但在文艺评论的追新族那里，后现代、后殖民、后奥运、后工业之类，有时真是会把真正的问题隔离或搞成概念游戏，过多关注概念时，内容往往被忽略掉了。

刘：对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您就家族小说、象征型寓言型小说、怀旧型小说、社会问题小说、都市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等有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对这些小说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表达过由衷的欣喜，但论及小说观念时，您说与《日瓦格医生》等相比，我们的长篇小说观念需要“刷新”。请问，这里您主要指的是什么？

雷：我主要指要多关注真切的人生，触及深层的人生和人性，与时代保

持某种必要的“距离”，敢于逆向思维，甚至提出抗辩性的见解，也即独立思考的见解。

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城堡》、显克维支《你往何处去》等人生含量大的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较少涉及人生哲学，间或涉及，往往多是逍遥放任或消极的哲学，而较少健康挺拔的哲学。如王小波《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红拂夜奔》《王二风流史》等可能是这类小说的典型。他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这段话的三层意思经常穿插在王小波的小说当中：一、有人蔑视强权、无视生活中的条条框框而我行我素；二、有人专以给别人设置规范、条例、监狱、陷阱、麻烦为喜好、为特长、为职业、为荣、为是而费尽脑血东奔西颠；三、有人对别人加给自己的莫名的灾难、不公、伤害、毁坏都不惊不作、不恼不怒、安之若素。王小波小说中刻画了以上三种人生状态，切近作者人生姿态的是不去设置别人，是被人设置而安之若素。王小波对设置人的人憎恶、鄙视、沉默，但散发的哲学意味却似乎过于逍遥。

雷：我对王小波没有太深的了解，但读过由几个中篇合成的长篇《黄金时代》和一些精彩的随笔。王被认为是一个有哲学意味的自由的歌者。他的小说被认为是比田园牧歌更有深意的歌谣，是超越了艰辛岁月真实痛楚的自由歌谣，但比如描写“文革”残酷岁月中的艰难辛酸而有逍遥自由的意味时，让人感觉不太真实，让人感觉似在回避什么。但有意义的是，这类哲学主要是给人以启示，一方面是消解伪崇高，另一方面是让人冷静下来，老实一点。表面上，这类小说有精神逍遥之态，事实上，这样的小说没有拒绝思考。实际的情况是，在精神逍遥的表现之后有苦心，启开的是另外一个空间，让人看清现实伪装的一些样子。其实，王蒙的许多小说也都具有哲学的意味。

刘：您的评论中，解析农民问题的较多。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关注的“农民灵魂”是什么？

雷：在我看来，像《人生》《平凡的世界》，包括后来的《浮躁》《白鹿原》等作品，都充满主体矛盾，对农民“一方面，在情感上，尊敬并推崇农业文化中的宽厚、温情、纯朴，农民身上的坚毅和刻苦，把它看作精神栖息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意识上，对世世代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又持否定的态度，期待农民母体诞生新的分子，创造另一种崭新的

活法儿和精神价值”。农民问题在当代文学中不断被新符号着，被新表达着。新世纪以来，陈应松、陈桂棣、迟子建、孙惠芬、胡学文、罗伟章、刘庆邦、荆永鸣、王十月等都写了农民及农民工的困惑、紧张、漂泊、辛酸甚至无告的小说，有很多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陈应松《马嘶岭血案》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文化心理冲突，以及走火入魔般的病态和疯狂。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本中，有讴歌农民精神的，但在讴歌的转瞬之间，质疑的心思悠然升起，意思是渴望新的精神替代之，理想的农民精神和新型的农民人格还正在伴随现代转型而建构中。

刘：您在综评2005年长篇小说时，用了“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这样的表述，您对王蒙的《尴尬风流》、阿来的《空山》、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毕飞宇的《平原》、北村的《愤怒》、东西的《后悔录》、杨志军的《藏獒》、刘兆林的《不悔录》、曹文轩的《天瓢》、张者的《零炮楼》、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丁庄梦》、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都有直面的评价，请问您是否在这些小说中感觉到了新的精神气象，我指的是那种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前所未有的，但就全人类而言又是很久坚守的精神品质？

雷：应该说，有，但不是很丰厚，各个作品情况和成就不一。正如你所称道的，北村的《愤怒》展示的正面的精神资源对人生的真正幸福是有好处的，这样的小说我们应该仔细体会真正好的精神生态是什么。

刘：您在谈到“农民工小说”“打工文学”时说，这类作品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对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类作品中的“农民工”一旦成为“农民工”就成了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他们的不幸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后者尤为突出。我认为，您是用心说出这些话的。

雷：农民工的生存，从肉体到灵魂都处在漂泊状态，在精神上他还不是自己的主人。文学只能揭示目前的状况，但其灵魂状况更需要社会去关注。

刘：在全面论述新世纪小说时，您说有些小说在“人的再发现”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您的这一表达让我眼前一亮。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次人的发现，我以为您的表达是可以归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四次人的发现”的一个构成部分。您是如何看的？

雷：人的再发现，是20世纪贯串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

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写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的表现得格外突出。张洁的《无字》、宗璞的《东藏记》都是关注日常的人的好作品。还有《我的丁一之旅》《外省书》《中国：1957》《远去的驿站》《英格力士》《解密》《隐秘盛开》《扎根》等，都在宏大叙事之后寻找人的日常价值。

刘：我想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雷：你这问题太大了，几乎无法回答，但也不是不可试着说一说。第一，我们需要有人类关怀的文学。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多有自足性、封闭性，有的还有狭隘民族情绪，好的文学无论是民族的还是人类的，都是关注人类共同的承担、共同的痛苦、共同的艰难努力、共同的捍卫与坚守。这样的作品体察的虽是具体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也即全人类的每一个人，也即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盯着战争当中的斗争派别利益。第二，我们需要有精神能力的文学。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缺乏超越现实客观真实的内在的精神能力，这当然与整个民族的精神信仰缺失状态有关。太多的是表象上的揭示、批判、否定，缺乏内在品质上足够的思想资源，足够的提升人的能力和造就人的能力。第三，我们需要有充足灵魂资源的文学，不能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或只有把苦水吐出来的能力，而没有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和幸福的能力，甚至没有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是危险的，那就像风中的飘尘、水中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底。

刘：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坚守的文化的根基是什么？

雷：这问题同样太大了。寻找文化的根也罢，探索民族精神的源头也罢，最终应该有一个肯定性本源，应该辨认出应该捍卫的价值点和关怀点。当年的寻根文学，有人热衷于区域性的文化形态，有人热衷于原始的生活方式，有人探究老庄哲学以至佛禅文化，有人要“走进去”，有人在“走出来”，都有一定的诉求和期望，但落脚的价值点往往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不是作者不满意，就是读者不满意，总觉得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